

由性善到行善

——孟子慈善思想探析

樊琪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慈善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善的修为,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性善论”。“不忍人之心”是其性善理论的出发点,并认为也是人们发出行善举动的心理根由。本文试从孟子的人性论中富含的良知良能、义利价值观、仁政学说挖掘宝贵的早期慈善思想,从而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勃兴提供自然基础、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

[关键词]性善;义利观;民本;仁政;慈善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592(2013)06-0104-03

一、善的禀赋与可能

中国古代关于人性善恶的观点主要分为四种,第一种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即无善无恶论;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性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即人性有善有恶论;第三种意见认为,人性本善,以孟子为代表;第四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人性本恶,以荀子为代表。孟子的性善论首先是建立在否定人性无善恶的基础之上,认为人性是有善恶之分的,这是其人性论的大前提,类似于第二种人性可善可恶论,但孟子坚持的是人性一元观,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就有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

孟子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体现在,首先,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肯定了性善的普适性,人人都有善根。其次,确立了善的道德本性,顺着本性就能为善,这是一种先验的、内生的属性,赋予了人们向善的内驱力和能力。甚至可以说,儒家核心理念中孔子思想的“仁”在孟子这里就体现为“不忍”。具体来讲,孟子认为善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四端”是人本身所固有的,也是人作为社会人的最基本属性,是一种精神的道德法则,类似于康德的道德律

令。可见,“四端说”是一种带有先验主义色彩的人性论,是孟子对人本性的一种先验的假设。但是“四端”只是一种善的萌芽,是指人人皆有善根,人人都具有善的禀赋与可能。但是善端若不加以扩充和指导,仅仅停留在主体内部,就无法转化为现实行径。

因此,孟子所讲的性善,既是指人生而有善的禀赋,更是指人具有向善的能力,这是一种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能力。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可见,孟子的性善是禀赋与能力的统一,可谓是一物两体,不能割裂的。

对个体的人性修养而言,仅仅有向善的禀赋是不够的,要想从潜在的善变成现实的善,必须下一番存养扩充的功夫,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从性善的假设出发,顺着“四端”善根正向发展,就上升到“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上。秉承仁义礼智之德性,完成善的践行,就国家层面,就是要行不忍人之政。王者是生而具有四端善心,且仁义礼智的发展程度更加完善,君王怜悯体恤百姓,设身处地的为百姓考虑,关爱天下苍生。

[作者简介]樊琪,女(1988—),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二、善的存养与选择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关系的争论。“义”一般指仁义道德,体现着社会公利之道德标准和道德原则;“利”则指个人物质利益、功利名誉等。所以,义利观实质上探讨的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基本的伦理矛盾。具体来讲,这对矛盾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道德与利益二者何为第一性,即谁决定谁的问题;其二是在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后,还存在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

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作为孔子儒学思想的继承者,从性善论出发,孟子也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强调“义”的重要性并将其推向极端。孟子认为,“仁义”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孟子这里,义被赋予了绝对的优先性,是第一位的,义在利先,要做到“由仁义行”。而由仁义行,就必须“去利”,正所谓“去利怀义”。

在确立了义的第一性后,孟子主张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以义制利,用全社会普适的道德标准和利益原则来制约个人私利,要求人们为社会做出贡献,绝不能出现私利膨胀以致危害社会公利的情况,必要时还要为社会整体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即所谓舍生取义也,这是孟子所倡导的最高道德价值。孟子这里所提倡的义不仅是一种仁义道德,更是社会公义,坚持一种社会整体观。

义在孟子的整个道德论中不仅是立命安身的基础,更是养存、扩充善性的关键所在。如前述,内在善的秉赋并不会自觉实现,即使是心理动机也不会自动发展为现实的仁义礼智之德性。所以尽管每个人都具有天然的良知良能,但是如果他拒绝进行后天的存养扩充的道德实践,就仍会使其心与禽兽无异。因为孟子认为如果人仅仅追求吃喝就没有什么价值和禽兽差不多。“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3]。在人的生活、生命中,万事有轻重之分,所包含的价值大小是不同的,饱食只是次要部分,是小的部分,而道义是重要部分,大的部分,完成自我实现的部分,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道义是人的价值的真正体现。同时孟子还认为,善作为人的内在禀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得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具有道德主体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

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4]因此,在性善的前提下,个体要认识到“义”的重要性和自觉性,以道义为原则和指导,督促自己突破耳目之欲的局限,追求仁、义、礼、智,践履向善和为善,使善的潜能变为善的义举。

三、善的扩充与实现

如果说四端善心是行善的思想道德前提,仁、义、礼、智是行善的道德保障,那将个体的善推而广之用以实施仁政,才是善的最高实现,这既是孟子性善论的重点,也是孟子性善论的旨归。

民本思想是实施仁政的政治理论基础。民本思想即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作为定国安邦之根本的学说,是一种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民众利益的政治思想。他认识到民众在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想江山社稷长久安稳,必须重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民本思想渊源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重民的思想,据《尚书·泰誓》记载,周武王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对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发展,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学说体系当中。

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观点总结起来就是“民贵君轻”,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的治国理念。这样,他就把民众排在第一位,社稷排在第二位,而君王排在最后位。作为国家之本的民众,必须保障其生活丰衣足食,统治者要经常性的体察民情,倾听百姓声音,关心民众的疾苦,在自己享乐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天下的黎民,要善待老百姓,真正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不能苛刻他们,做到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顺应民心,推行仁政,以民为本,方能够得到民众的遵从和拥戴,由此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称王于天下。

至此,孟子将个人道德善心上升到国家政治策略,这也是孟子性善论的本质所在。通过内圣来为外王提供人性论基础,而只有仁政的实现才能使性善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在扩充为道德人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到社会层面,最终实现孟子的仁政理想,实现了人性与政治、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在明确了性善论的最终目标之后,怎样将之具体到现实层面呢?孟子认为君王实行仁政,那么推恩于民、体恤百姓、关怀弱者就是其应有之意了。首先,实施仁政就是要把亲亲、敬长这样的个人善举

放大并加以推广于天下,全民族都形成爱人、敬长、利他的社会正气。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6],以爱人之心得己及人,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要求人们以博大的胸襟去爱其他人。当然,这种道德价值在人际关系中也是相互的,即所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8]形成这样一种互动关系,由此才能形成社会层面的良性运转。其次,君王实行仁政,除了推恩于大多数百姓之外,对于那些无依无靠的穷民,更应该给予充分的关爱和照顾,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熟视无睹、放弃不管。齐宣王曾请教孟子“王政”的内容有哪些?孟子答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认为对于鳏、寡、独、孤等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君王要首先给予照顾,解决他们当前的生活困难。让年老的各有适当的归宿,年轻的各有一定的用处,年幼的各有应得的成长条件,鳏寡孤独和废疾人,都有受到赡养的权利。他主张使天下人皆有所养,皆有归于仁,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理想世界,是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

四、慈善事业的发展:由性善到善行

以上分别从人性论、义利观、民本思想等方面阐述了孟子思想中所蕴含的“性善论”文化体系,从中也发现许多有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有益资源,可以成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合理要素。

从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体系可以总结出:性善为行善确立了必然性和可能性,义利观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原则规范,仁政则将善念推向最高层次。孟子从性善出发,由此构成了一个从低向高、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理论体系,为慈善事业从善心到善行提供了宝贵财富。

首先,孟子的性善论为慈善活动提供了人性的自然条件,即人的本性之中就蕴含着为善的自然条件,这种自然条件表现为行善的可能和能力,既是一种心理倾向,也是一种现实能力。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但至少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为人们的慈善行为提供了先天基础,揭示出不论是大灾后的济危救困,还是平时生活中的守望相助都是具有自然生物条件的。使人们找到了向善为善的自然根基,这无疑对从事慈善活动起到正

向激励作用,从最深处增添信心。同时他体现了慈善行为的人文内涵,首先要明确的是人性不同于神性,人虽性善,但也不能像菩萨或上帝一样能够普度天下苍生,去除所有苦难,所以,孟子的爱不是泛爱论。其次,如前文讲,“义”的涵养使人性异于兽性,虽然动物界也会保护弱小,但那是一种出于生物性的本能反应。人的善举是建立在善心的基础上,通过“仁、义、礼、智”教化而为,确立了为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具有人文主义色彩。

其次,孟子的性善论为慈善活动提供了心理动机上的支持。孟子在阐述其“四端说”时提出人生而具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仁之心即“恻隐之心”,也就是我们现代心理学里所讲的同情心,人类的同情心是本能的道德素质,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内含着发展为高层次道德的萌芽,需要把这些萌芽状态的东西加以扩充,才可以向善、为善。孟子认为它是“仁”的端始,所有的慈爱善举都发自人们内心深处的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们行善的内在动力,是自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心的自然流露,它超越了个体的私利。正是出于对承受苦难的同胞的同情和怜悯,人才可能去爱他人,才可能促使人们去扶危济困、帮助弱者,从而形成慈善的事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最后,孟子的仁政学说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官办慈善事业及社会福利的兴起。孟子主张君王应该与民同乐,亲民、爱民、顺民,以民为本,正是由他的性善论出发,根据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促使当时的国君制定了一些带有社会福利和慈善性质的社会政策,制民之产、保民而王、薄其税、救助鳏寡孤独养民。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民、安民,以稳定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确实推动了古代福利事业的发展,丰富了传统慈善文化。

五、结语

我们不能片面放大同情心在慈善活动中的作用,它仅仅是慈善的精神动力之一,特别是新时代的慈善观念已发生转型,慈善行为不但是从情感因素出发,还要结合现实的利益考虑。同时传统的义利观容易使得慈善被冠以“君子修为”的崇高性,不利于慈善的平民化和大众化。

此外,还值得反思的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代
(下转第109页)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

“典型”这个文学理论中常见的术语,来自西方的文学理论,在希腊文中有模子的意思。这个术语最初强调的是形象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布和德里格尔的《青青的群山》篇幅巨大,情节曲折,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一百多名。按故事里的“健康势力”和“敌对势力”量大阵营来分别分析,也有值得称道的二十多个人物形象。而且个个形象鲜明,个性十足。

“健康势力”阵营里的主角是故事的主人公吉博呼郎,还有桃拉,嘎日步,瓦其尔,特格西等人。“敌对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吴辛,梅杰,达布希拉图,占布拉,希日木等人。

1.吉博呼郎

他就是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内蒙古地区干部的典型形象,在那种特殊的动荡年代,他心中怀着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的忠诚,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却坚信一定会有云开雾散的时候的老共产党员的典型。

2.桃拉

桃拉是广袤草原孕育的敢做敢为的草原女性的典型。她敢独闯盟委办公室找吉博呼郎,她敢“藏匿”当时被迫害的吉博呼郎,她敢爱人苏荣死后嫁给瓦其尔,她敢改革开放初期带领贫穷的相相亲奔小康。她像草原上的一株野马兰,是千千万万草原女儿的典型。

3.吴辛

吴辛,军人出身,历史上有一定的功劳,却总觉得怀才不遇,遇人不淑,在“文革”时期上窜下跳,“文革”以后还想继续稳坐“钓鱼台”的反党反人类人道主义的典型形象。

作为表现现实主义的作品,又是反映“文革”的伤感文学文本,人物形象当然是个别性和统一性的统一。“它要求感性,个别的形象必须包含某种大于其本身的意蕴,为读者感悟人生的普遍意义提供某种启迪”^[14]《青青的群山》人物形象就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主要的一点。

[参考文献]

- [1][2]布和德里格尔.我的思索追求与向往.哲里木文艺.1988,(7)
[3]布和德里格尔.关于《青青的群山》的思考.哲里木文艺,1992,(8).
[4]布和德里格尔.青青的群山.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2.
[5]布和德里格尔.青青的群山,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994:966.
[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16.
[7][8][9][10][11][12][13]布和德里格尔.青青的群山.上部 31.31.36.37.37.45.48.
[14]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艾力)

(上接第 106 页)

表的中国古代仁爱观是一种爱有等差的“亲亲”理念,而不是像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博爱、众爱,现代慈善强调的是一种地位平等,部分亲疏的社会化的仁爱。中国传统的慈善观念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停留在精英垄断的发展阶段上,即当时的慈善是由政府主办,并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其统治的稳定性。相比之下,现代慈善主体多元,力量丰

富,其功能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于完善社会保障,增进社会和谐。

总之,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慈善文化,更要顺应时代特征和现实情境,适时地进行改进、完善,才能使我国的慈善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9]杨伯峻.孟子译注·公孙丑章句上[M].中华书局,2008.12:55 ;132 ;132 ;158 ;211 ;252 ;14 ;17 ;33.

(责任编辑 舒丽丽)